

城市产业发展、就业需求与人口流动：中国与国际经验^①

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y, Demand of Employment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Experience from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ed Countries

都阳 Du Yang 屈小博 Qu Xiaobo^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典型国际大城市在城市产业分布、就业与人口聚集方面的一般规律及特征,揭示相应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人口规模、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就业分布关系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将会根据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不断调整,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需求变化促进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由此城市人口流动及规模相应发生变化,国际大城市人口总量规模及其增长也将随之变动直至趋于平稳。

关键词: 大城市; 产业分布; 就业需求; 人口规模

中图分类号: X8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 and population accumulation from some typical international big city amo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d Europe, reveals distribution relations of population size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labor employment in the corresponding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find, due to change of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could continuously change and adjust according to relative factor prices. The market mechanism could adjust labor demand and promot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working age. Therefore, not only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size will correspondingly change but also the total population size and growth will change and tend to be steady.

Key words: Metropolis,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Demand of Employment, Population Size

1 引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中国,理解城市发展和规模扩张的一般规律及其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握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就更加困难。好在自从发达经济体实现工业化以来,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城市发展与人口规模也的确表现出一般的规律性。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2009》清晰地刻画出来本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人口聚集和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扩张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伴随着人口规模膨胀而不断提升的经济效率^[1]。但同时,人口的过渡聚集会带来拥挤,也就是我们常常观察到的“大城市病”。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的拥挤也会带来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扩张的动力和制约城市的力量,相互制约、形成平衡,并决定了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正如埃尔·莎科斯(E.Shaks)所认为的,城市规模的分布是与经济发展时期的变化相关联的^[2]。因此,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的均衡发展是要形成产业结构

^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劳动力市场转折对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挑战及政策应对(编号:71173234)。

^② 作者简介:都阳(1971-),男,安徽六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劳动就业、人口与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与中国改革等。屈小博(1974-),男,陕西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及收入差距。

分布及其就业需求与人口规模及特征相适应的格局。

本文通过分析揭示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典型国际大都市——纽约、东京、巴黎和伦敦等国际大都市人口规模、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就业分布关系及特征。以北京为例，比较中国与同等人口规模的发达国家国际性大都市在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就业分布及结构方面的差异，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产业布局与人口流动和规模变动提供有益的国际经验。

2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典型国际大都市

通过对比北京与东京、巴黎、纽约及伦敦等发达国家典型的国际性大都市发展中人口、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数据发现这些城市呈现出以下一些显著的特征：首先，相对于所在的经济体，国际大都市城市人口总量规模巨大，人口密度高。从可获得的数据观察（表 1），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在 800-1900 多万之间，与纽约等其它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人口总量相对较高，其中，纽约、东京、巴黎常住人口总量已超过或接近 1200 万，中心城市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2 万人的城市有东京^③、巴黎、纽约和北京，并且纽约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高于北京。因此，从人口规模总量和人口密度上来看，北京与这四个国际大都市有相似的特征具有可比性。

表 1. 典型国际大都市的人口特征

城市	人口规模 (万)	占全国人 口比重 (%)	人口密度 (人/平 方公里)	中心城市 人口密度	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 (%)		就业率 (%)	
					城市	全国	城市	全国
东京*	1298.9	10.2	5896	-	69.1	64.7	48.8	56.6
巴黎	1174.6	18.2	978	20,648	74.8	64.9	67.8	71.4
纽约	1937.8	6.28	401	26,430	68.3	66.9	70.0	72.6
伦敦	755.69	12.4	4807	9,397	70.2	66.1	69.8	74.3
北京	1961.2	1.43	1195	23,407	82.7	74.5	81.3	76.2

注：（1）巴黎数据为 2009 年，根据“Paris Region Key Figures 2011”计算；
 （2）北京数据为 2010 年，根据《北京统计年鉴 2011》及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数据计算；
 （3）纽约就业率为 2008 年数据，人口数据为 2010 年，根据“2009 New York State Statistical Yearbook”和 U.S. Census Bureau, “Demographic Profiles: Census 2010”计算；
 （4）“*”东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业率为 2005 年，人口密度为 2008 年，占全国人口比重为 2009 年，根据《东京都统计年鉴 2009》计算；
 （5）伦敦数据为 2007 年，根据“Focus on London: 2009”计算；
 （6）劳动年龄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为 2008 年，日本、法国、美国、英国的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2011》。

其次，国际大都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普遍高于所在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就业率相对偏低。表 1 的结果显示，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平均达到了 70% 左右，高于所在国家比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就业率分别高于和低于全国。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迁移所致，由于迁移劳动力集中到大城市，但并不必然立即能够获得工作机会，故而造成了劳动年龄人口较多但就业率相对低的情况。无论对劳动力的国内迁移还是国际迁移，国际大都市都是吸引所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例如，巴黎非法国籍迁移劳动力比重已达常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 12%^④。北京因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和人口红利的原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就业率都高于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平均水平。从统计数据观察，

^③ 由于东京官方统计数据中缺乏计算具体的东京人口密度，但有关研究表明 2005 年，东京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突破每平方公里 2 万人。
^④ 数据来自“Paris Region Key Figures 2011”的计算结果；以下巴黎的数据来源相同。

北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就业率保持一致，与国际经验存在差异，高于全国水平。

第三，国际大都市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就业者的社会经济职业身份比重高于所在国家平均水平。例如，巴黎的就业总量中（2009），有 29% 是管理者和高专业技能的就业者，而法国平均水平只有 13%；中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也占到了 25%，非体力劳动者占 27.8%；体力劳动者占 13.2%，而法国的平均水平为 24%；其他就业身份占 5.0%。

3 产业分布与劳动力需求特征：国际经验

第一，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分布中，服务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有绝对的比重，制造业等其它产业比重平均水平接近 10% 左右。从表 2 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来观察，建筑业和制造业占城市 GDP 总的份额平均水平在 10% 左右，其中，建筑业占城市 GDP 总的份额在 4% 左右（如东京、巴黎、伦敦，纽约为 3.15%）；制造业占城市 GDP 总的份额中，东京和巴黎的比例稍高于纽约和伦敦，相比较，这与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有关。而服务业占城市 GDP 总的份额东京为 84.9%、巴黎为 87.2%、纽约为 91.2%、伦敦为 89.7%。相比较而言，北京服务业占城市 GDP 总的份额只有 75%，与其他几个城市平均相差近 15% 左右。与此同时，北京的制造业的比重高出其它国际大都市十几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明显偏高，从这个方面来看，北京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从人均 GDP 来看，国际大都市人均 GDP 均明显高于所在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但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的人均 GDP 水平与其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远小于北京与全国人均 GDP 的差距，同时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的人均 GDP 水平高出北京约 5-6 倍（表 2），这也是北京与国际大都市的显著差异所在。

表 2. 国际大都市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结构-产值份额

城市	城市 GDP 占全 国份额 (%)	建筑业占城市 GDP 份额 (%)	制造业占城市 GDP 份额 (%)	服务业占城市 GDP 份额 (%)	人均 GDP (美元/人)	
					城市	全国
东京	17.8	4.66	8.67	84.9	65,371	37,179
巴黎	28.9	4.0	8.2	87.2	66,324	41,771
纽约	7.73	3.15	5.4	91.2	55,996	45,691
伦敦	20.6	4.0	5.5	89.7	66,413	39,949
北京	3.5	4.42	19.6	75.1	11,218	4,416

注：（1）纽约为 2009 年，根据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State," February 2011 数据计算；

（2）北京为 2010 年，根据《北京统计年鉴 2011》计算；

（3）巴黎为 2009 年，根据“Paris Region Key Figures 2011”计算；

（4）东京为 2009 年，根据《东京都统计年鉴 2009》计算；

（5）伦敦数据为 2007 年，根据“Focus on London: 2009”计算。

第二，国际大都市各产业的就业结构与其产业分布结构基本保持一致。从表 3 的结果可以观察到，东京服务业就业比重占 82.6%，巴黎服务业就业比重占 85.0%，纽约服务业就业比重占 91.2%，服务业就业对城市就业贡献的份额占据绝对比重，并且与其产业结构分布（表 2 的产值份额）保持一致。这表明服务业不仅是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是国际大都市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和创造者。而相应的建筑业就业比重、制造业就业比重与其产业结构比重（产业份额）比重基本保持一致。相比较而言，北京制造业就业份额明显高于其

他国际大都市，北京单位从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比重占 17.3%^⑤，而服务业就业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发展经验的平均水平。

表 3. 国际大都市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结构-就业份额

城市	城市就业占全国 份额 (%)	建筑业就业占城市 份额 (%)	制造业就业占城市 份额 (%)	服务业就业占城市 份额 (%)
东京	6.97	4.81	11.7	82.6
*巴黎	21.8	4.80	9.7	85.0
纽约	6.6	3.57	5.34	91.2
伦敦	12.3	-	-	-
北京	1.73	6.1	17.3	76.1

注：（1）纽约为 2009 年各产业非农就业份额，根据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2011 Statistical Abstract”数据计算；

（2）北京为 2010 年，城市就业占全国份额为实际就业数；

（3）“*”巴黎为 2009 年的分产业就业份额数据，根据“The Paris Île-de-France region 2011”计算；

（4）东京为 2009 年，根据《东京都统计年鉴 2009》计算；

（5）伦敦数据为 2007 年，根据“Focus on London: 2009”计算。

第三，国际大都市的产业分布集中于生产率较高的行业。从表 4 东京、巴黎、纽约的发展经验来看，各产业生产率的表现与国际大都市产业分布结构及各产业的就业需求结构状况相一致。其中，东京的服务业生产率为 206,673 美元/人，比制造业生产率 149,488 美元/人高出 38%，并高于东京城市整体生产率；巴黎的服务业生产率为 116,279 美元/人，比制造业生产率 983,51 美元/人高出 18%，比建筑业生产率 92,456 美元/人高出 26%，也高于巴黎城市整体生产率；纽约的服务业生产率为 129,501 美元/人，高于制造业生产率 127,524 美元/人和纽约城市总体生产率。这表明生产率高低不仅体现在了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分布和就业需求，而且更是国际大都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调整的主要依据之一。然而很明显，北京城市总体生产率水平跟其他四个国际大都市还有很大差距（表 4）。

表 4. 国际大都市各产业生产率

城市	城市生产率	建筑业生产率	制造业生产率	服务业生产率
东京	201,221 美元/人	194,955 美元/人	149,488 美元/人	206,673 美元/人
*巴黎	112,398 美元/人	92,456 美元/人	983,51 美元/人	116,279 美元/人
纽约	126,867 美元/人	111,699 美元/人	127,524 美元/人	129,501 美元/人
伦敦	135,573 美元/人	155,912 美元/人	135,098 美元/人	-
**北京	15,772 美元/人	-	-	-

注：（1）*巴黎的生产率指标为 2006 年，根据“The Paris Île-de-France region 2008”计算；

（2）纽约的生产率指标为 2009 年，根据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State,” February 2011,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2011 Statistical Abstract”数据计算；

（3）**因为缺乏北京的分产业实际就业数据，“-”表示缺失北京各产业的生产率指标；

（4）东京为 2009 年，根据《东京都统计年鉴 2009》计算；

（5）伦敦数据为 2007 年，根据“Focus on London: 2009”计算。

（6）东京、巴黎、伦敦和北京均按当年汇率折算美元，表 2、表 4、表 5 采用相同折算标准。

^⑤ 制造业实际就业比例还要高于单位就业比例。

第四，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内部高端服务业与低端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呈现反向关系，即高端服务业产值比重高，但相对就业少，而低端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较低，但和更多的就业相联系。我们根据国际经验和有关研究，将服务于生产和商业的服务业定义为高端服务业，将主要服务于人的服务业定义为低端服务业。在服务业内部细分产业中，金融业、Business-to-Business 服务业（为生产、商贸服务的服务业）、信息产业以及专业与商业咨询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其产业分布的产值比重与就业需求也呈现类似反向关系。

表 5. 国际大都市服务业产业结构：产值、就业份额与生产率

城市	高端服务业 占城市 GDP 份额 (%)	低端服务业 占城市 GDP 份额 (%)	高端服务业 就业占城市 份额 (%)	低端服务业 就业占城市 份额 (%)	高端服务业 生产率 (美元/人)	低端服务业 生产率 (美元/人)
东京	60.2	24.7	9.02	73.6	13,425,92	67,435
*巴黎	48.0	39.2	35.0	45.1	168,273	107,976
纽约	52.7	38.4	23.6	67.4	274,214	92,295.9
伦敦	46.9	42.8	-	-	-	-
北京	35.6	39.5	22.6	53.5	-	-

注：（1）巴黎高端、低端服务业占城市 GDP 的产值份额为 2009 年，根据“Paris Region Key Figures 2011”计算，“*”高端、低端服务业的就业份额为 2006 年，根据“The Paris Île-de-France region 2008”计算；（2）北京高端、低端服务业就业份额为 2010 年单位就业人数的数据计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1》；（3）纽约高端、低端服务业产值份额、就业份额及生产率均为 2009 年，根据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State," February 2011,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2011 Statistical Abstract"数据计算；（4）东京为 2009 年，根据《东京都统计年鉴 2009》计算；（5）伦敦数据为 2007 年，根据“Focus on London: 2009”计算。伦敦高端服务业的口径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其余为低端服务业。

从表 5 国际大都市的经验数据可以看出，东京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 60.2%和 24.7%，而就业需求比重分别 9.2%和 73.6%；巴黎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 48.0%和 39.2%，而就业需求比重分别为 35.0%和 45.1%；纽约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 52.7%和 38.4%，而就业需求比重分别为 23.6%和 67.4%。另一方面，高端服务业的生产率远高于低端服务业生产率。其中，东京的高端服务业生产率是低端服务业生产率的 20 倍，巴黎的高端服务业生产率比低端服务业的生产率高出 56%，巴黎的高端服务业生产率比低端服务业的生产率高出约 300%。这些进一步体现的是这些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更多地集中于生产率高的高端产业。

巴黎的服务业细分产业结构分布与就业需求结构也呈现上述类似的反向关系。纽约产业分布与就业需求，交通、零售贸易和仓储，教育健康和文娱娱乐业，社会组织和公共管理等低端服务业的产业分布与就业需求同高端服务业相比较，则呈现刚好相反的关系^⑥。北京服务业细分产业中，金融业、信息产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产业分布与就业需求还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关系，及其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与其他国际大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4 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分布与就业结构变动

随着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迎来其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无限供给

^⑥ 巴黎和纽约的服务业细分产业结构分布与就业需求结构的关系根据表 1-表 5 数据来源。

的特征逐渐消失，人口即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影响，改变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要素价格和投入（蔡昉，2007）^[3]。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了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满足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Lewis, 1972; Ranis and Fei, 1961）^[4-5]。因此，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将会根据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这将会使城市动年龄人口就业结构和规模怎样随之发生变化？这点日本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根据有关研究，日本在 1960 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Minami, 1968）^[6]。一个经济体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升，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出现较快的增长。从图 1 可以看出，日本在 1960 年跨越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东京的工资上涨幅度很快，从 1960-1965 年间，东京地区的平均名义工资指数出现了明显的快速上涨。如果以 1960 年东京地区平均名义工资为基数（1960=100），刘易斯转折点后的 5 年，1965 年东京地区的平均名义工资指数相对于 1960 年已经上涨到 157.6，名义工资上涨了 50%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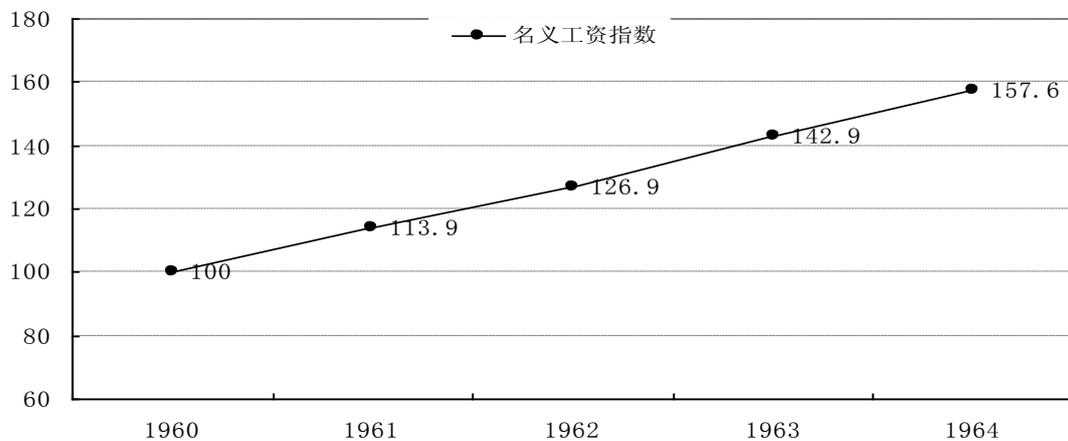


图 1. 刘易斯转折点后东京 1960-1964 年名义工资指数

数据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1961-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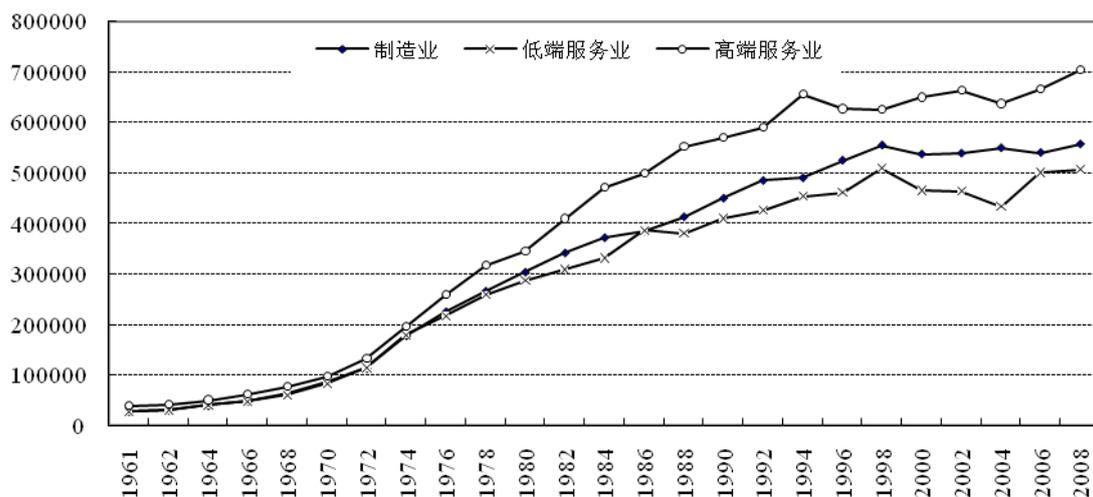


图 2. 日本刘易斯转折点后东京 1961-2008 制造业、高端和低端服务业工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东京统计年鉴 1961-2009》。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历史视角来观察日本在当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发展阶段，东京这个大都市各个产业的工资增长情况及趋势，就会发现，东京各产业的工资上涨是普遍性的（图 2），即不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均呈现出长期的工资上涨趋势。从图 2 可以观察到，日本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东京的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均呈现长期的增长趋势。

其中，（1）高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总体上增长幅度要远高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且，在刚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的 1960-1970 年间，高端服务业、制造业以及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幅度及水平基本保持相同的增长幅度。

（2）到 1970 年代以后，高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并且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而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在 1970-1980 年间基本保持相同的增长幅度和水平。

（3）1980 年之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增长幅度超过了低端服务业，这是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相应的对制造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低端服务业由于是主要服务于消费者和居民生活为主的服务业，其从业劳动力相对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要求的人力资本较低，因而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同样，高端服务业则是以知识、技术以及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所在，其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也因此是最高的。

表 6 刘易斯转折点后东京的产业布局 and 结构变化（%）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其中： 制造业（%）	合计（%）	其中： 高端服务业（%）	其中： 低端服务业（%）	
1961	0.6	36.8	31.2	62.6	35.7	26.9	
1962	0.6	36.1	30.4	63.3	36.5	26.8	
1964	0.4	37.7	30.0	61.9	35.8	26.1	
1966	0.3	33.9	28.7	65.8	39.1	26.7	
1968	0.6	36.1	29.9	63.3	35.9	27.4	
1970	0.5	36.1	29.6	63.4	36.0	27.4	
1972	0.4	33.1	26.5	66.5	38.5	28.0	
1974	0.4	29.1	21.6	70.5	39.0	31.5	
1976	0.4	30.4	23.3	69.2	40.7	28.5	
1978	0.4	30.6	23.5	69.0	39.0	30.0	
1980	0.3	31.1	25.2	68.6	41.7	26.9	
1982	0.3	31.5	24.2	68.2	43.2	25.0	
1984	0.3	30.5	23.8	69.2	44.6	24.6	
1986	0.3	30.2	21.9	69.5	44.4	25.1	
1988	0.3	27.3	19.4	72.4	47.8	24.6	
1990	0.2	27.4	19.0	72.4	47.5	24.9	
1992	0.2	26.9	18.1	72.9	49.0	23.9	
1994	0.2	25.8	17.9	74.0	49.5	24.5	
1996	0.2	25.0	17.5	74.8	50.8	24.0	
1998	0.2	23.5	16.7	76.3	52.2	24.1	
2000	0.1	19.7	13.5	80.2	54.2	26.0	
2002	0.1	18.5	12.7	81.4	55.7	25.7	

2004	0.1	16.3	11.1	83.6	59.2	24.4
2006	0.1	15.2	10.4	84.7	60.1	24.6
2008	0.0	15.3	10.3	84.7	59.6	25.1

数据来源：根据《东京统计年鉴 1961-2009》计算。

一个经济体跨越了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由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要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就必须提高工资。工资上涨的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增加，这会导致各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从而使产业布局及其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有更高劳动生产率及产出的产业会增长更快，所占比重较高。表 6 是日本刘易斯转折点后的东京 1961-2008 产业布局的变化趋势^⑦，显示出工资上涨对产业布局变化的影响，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 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地区产出的比重明显下降并出现长期趋势，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地区产出的比重快速增加。其中，第二产业由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的 1961 年 36% 左右下降到 2008 年的 15% 左右，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由 1961 年的 62% 左右增加到 2008 年的 84%，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

(2) 制造业占东京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幅度最为显著，也是东京整个城市产业布局结构变化的关键。其中，东京制造业比重从 1961 年 31.2%（占整个第二产业比重的 85%）下降到 2008 年的 10.3%（占整个第三产业的 67%）。

(3) 东京产业布局结构变化中，高端服务业比重的不断增加是整个服务业产出比重增加的关键，而低端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产出比重增加的贡献很小，基本保持一个稳态状况。其中，高端服务业从 1961 年前后占地区总产值的 36% 左右增加 2008 年前后的 60% 左右，增加了 24%；而低端服务业在 1961-2008 年间占东京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在 25%-31% 之间波动，1961 年低端服务业的比重为 26.9%，2008 年的比重为 25.1%，基本又回到了日本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初始水平。

因此，根据日本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东京产业布局变化的特征显示，制造业产出比重的明显下降与高端服务业产出比重的不断增加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而低端服务业占城市经济总产出的比重则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比例。制造业、低端服务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高端服务业属于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随着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高端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低端服务业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由此产生劳动力需求变化促进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相应的人口流动和规模也会发生变动。

5 大城市产业发展与人口流动和规模的特点及启示

从国家人口转变和工业化发展过程来看，世界上持续经济增长走向富强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制度和技术革命（进步）导致人均产出的增长率远高于人口增长率过程。因此，人口结构及其规模与经济发展过程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动必然会影响人口转变的过程和结构变化。国际大都市作为其所在经济体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变化方式也是最为迅速的，相应的其人口结构和规模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首先，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即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将会根据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不断调整，直至稳定状态。而其经济体内的国际性特大都市的产业布局调整速度和幅度会更快，即制造业产出比重的明显下降与高端服务业产出比重的不断增加，低端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相应基本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比例，从而促进大都市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因此，市场机制将在调节城市人口总

^⑦ 表 6 中的百分比均为各产业占东京地区总产值的比重。

体规模上，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市场机制调节就业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性大都市人口总量规模及其增长也将随之发生变动直至趋于平稳。

其次，从发达国家国际大都市的产业分布与就业需求可以明显地总结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完成工业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劳动年龄人口的产业间分布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城市就业人口结构最明显的变化表现为第二产业劳动人口的迅速减少和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东京、巴黎、纽约等大都会的第三产业产出比重平均分别高达 84.9%、87.2%、91.2%，就业人数分别占各自城市总就业的 82.6%、85.0%、91.2%。

第三，国际大都市的人口规模总量普遍巨大，人口总量比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均明显高于所在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流动人口增长迅速，并且带动了城市人口的年龄、人力资本结构等就业结构与就业需求相适应的快速变化。由此，人口流动和规模变动随之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和产业分布。

因此，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产业发展、就业需求与人口规模变动的规律的已经经历的国际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主要为：以北京为例，目前的发展阶段还处于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产业结构和布局不断调整的时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及其调整，以及服务业内部高端服务业与低端服务业的结构调整还有很大空间，这相应会产生劳动力就业需求的变化，导致就业人口和人口流动及规模的相应变动。同时，由于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进一步引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流动也会发生变动。这对中国城市发展和规划具有政策含义，中国的大都市发展应当遵循城市产业发展、就业需求与人口规模变动的发展规律，在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没有达到国际发展经验的稳态情况下，不宜人为做过多的政策推进或制约，尤其是不能违反发展规律逆向行政干预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

参考文献：

- [1] 世界银行著，胡光宇等译.《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月。
- [2] 董利民著.《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 [3] 蔡昉.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7（3）：4-12.
- [4] Lewis, W.A. (1972),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r," in Luis DiMarco (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72.
- [5] Gustav Ranis, Arthur Lewi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91 (August), 2004.
- [6] Ryoshin Minami,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2, No. 3, Aug., 1968.